



权力运作中的政治修辞

——美国“反恐战争”

(2001—2008)

刘文科 著

人民出版社



权力运作中的政治修辞
——美国“反恐战争”
(2001—2008)

刘文科 著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钟金铃

版式设计:周方亚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权力运作中的政治修辞——美国“反恐战争”(2001—2008)/刘文科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7

ISBN 978-7-01-008946-1

I. ①权… II. ①刘… III. ①反恐怖活动-研究-美国 IV. ①D771.28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92482 号

权力运作中的政治修辞

QUANLI YUNZUO ZHONG DE ZHENGZHI XIUCI

——美国“反恐战争”(2001—2008)

刘文科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市文林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0 年 7 月第 1 版 2010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14.5

字数:210 千字 印数:0,001-3,000 册

ISBN 978-7-01-008946-1 定价:35.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政治修辞：一个观察权力运作的新视角

（代序）

张星久

如果套用西哲所谓“语言是存在的家园”，说“语言是权力存在的家园”也许并不为过。正是鉴于对语言现象与权力现象之间密切关联的认识，从语言和言语的角度研究政治权力问题就成为晚近政治学研究的一个新趋势。就此而言，刘文科博士的《权力运作中的政治修辞——美国“反恐战争”（2001—2008）》一书以美国“反恐战争”为典型案例，通过政治修辞来考察政治权力的具体运用，的确具有独到的视角，走在了学术研究的前沿。

语言现象和权力之间的密切关系固然是复杂的、多方面的，但从政治学的角度看，最直接、明显者莫过于语言现象关乎权力的合法性（或正当性）问题。诚如韦伯等人早就指出的那样，任何人要想维持统治权力的存在和运行，除了暴力驱迫下的强制服从或被迫服从之外，还需要社会成员起码程度的自愿服从，亦即某种程度的权力合法性。这样，千方百计地“换取”人们的自愿服从，以获得统治权的合法性，就成了权力运行或者权力实践中重要的甚至是核心的问题。为了“换取”人们对自己权力的自愿服从乃至支持，就必须借助一定的语言和言语行动，按照权力实践的需要向社会成员灌输特定的价值观念和政治评价标准，建构起一个社会在文化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同一性，将社会成员“驯服”为一个心甘情愿的甚至是“愉快”的服从者

和拥护者。在这一过程中,政治修辞的技术、策略问题就成了事关权力能否具有合法性、可否被顺利运行的重大政治问题。正是基于这一思路和理论切入点,《权力运作中的政治修辞——美国“反恐战争”(2001—2008)》一书通过美国“反恐战争”的具体事例,生动地展现了政治修辞在权力运作中的具体作用;尤其是作者所涉及的是目前国内学术界几乎乏人问津的一个新领域,其学术探索的勇气与创新精神是难能可贵的。特别需要提及的是,当初选择这一问题撰写博士论文的时候,不光很少有前人的研究成果可资借鉴,作者本人的学术功力、知识准备也并不是很好,然而经过几年的艰苦雕琢和坚持不懈的探索,竟能修改完善成书,而且学术水准超出了我最初的想象,其所付出的艰辛努力可想而知,所表现出来的坚忍不拔的探索精神实在令人感佩。

阅读此书会发现,它至少在以下方面是有其学术价值和贡献的:

首先,该书通过具体事例,精细、生动地揭示了政治修辞与权力之间的关系,凸显了政治修辞在权力实践和权力运转中的地位,提醒人们应注意从言语行为、政治修辞的角度去深入研究权力现象,进一步拓宽了政治权力的研究视野与领域。

其次,本书在推进权力合法性研究方面作出了有益的尝试。已有的合法性研究告诉我们,一种权力要想得到人民的“自愿”服从,自然要通过一定的意识形态对人们进行教化、规训,而要进行这种教化、规训,当然离不开语言和修辞策略,从而合法性的建构过程也可视为一定的语言策略运用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以修辞的角度研究权力合法性应该是合法性研究中的题中应有之义。然而我们以往的研究要么未能来得及深入到这个层面,要么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这本书则顺应了学术研究的新趋势,让我们更为清晰地看到权力是如何在语言中运行、合法性是如何在修辞中生成的,从而在推进合法性研究走向纵深开掘、走向精细化发展方面作出了可喜的贡献。

最后,尽管本书涉及的是一个比较新的研究领域,然而作者却能经过一番艰苦的理论抽象和概括工作,提炼出一套分析概念体系和分析框架,使政治修辞与政治权力的研究更具可操作性,这起码为今后这方面的研究做了

一定的铺垫和基础性工作。

当然，由于本书涉及的是一个难度很大的研究课题，加之作者本人的学术功力也有一个逐步提高的过程，问题和缺憾在所难免，如能得到学界前辈和同行的批评教正，对作者和这项研究本身都是善莫大焉。

2010 年春于武昌珞珈山

目 录

政治修辞:一个观察权力运作的新视角(代序)	张星久 1
-----------------------------	-------

导 论	1
一、政治修辞的必要性、普遍性和功能分析	1
二、政治修辞研究的价值	16
三、政治修辞研究的学术基础	20
四、政治修辞理论的深化与发展	36
五、本书的研究结构	40

第一章 政治修辞的一般原理	44
第一节 政治修辞的概念	45
一、修辞的概念	45
二、政治修辞的概念	47
第二节 政治修辞的基本要素	51
一、主体	52
二、情景	53
三、受众	54
四、主题	55
五、论证	56
六、效果	57

第三节 政治修辞的手段	59
一、寻找适当的论据	59
二、采用一定的文化与用语框架	63
三、运用一定的论证模式	67
四、修辞格的应用	70
小结	77
第二章 美国“反恐战争”的合法性建构	78
第一节 “恐怖时代”与战争合法性建构	78
一、“新恐怖时代”——美国“反恐战争”的逻辑起点	81
二、“极度紧急状态”——美国“反恐战争”的紧迫性	83
三、“极度危险的超级恐怖主义敌人”——美国“反恐战争”的重要性	86
四、“内部敌人”——美国“反恐战争”的另一战场	90
第二节 “正义反恐战争”的合法性建构	92
一、战争理由是正义的	93
二、战争行为是正义的	98
三、战争是最后的手段	105
四、胜利幻想	108
小结	113
第三章 美国“反恐战争”政治修辞的论证	114
第一节 美国“反恐战争”政治修辞的论据	114
一、人品诉求	115
二、理性诉求	119
三、情绪渲染	123
第二节 二元对立的政治修辞	127
一、二元对立的政治文化框架	128
二、二元对立的政治用语框架	132

第三节 政治委婉语和附带性政治语言	138
一、政治委婉语	139
二、附带性政治语言	145
小结	149
第四章 美国“反恐战争”政治修辞的情景与受众分析	150
第一节 “反恐战争”政治修辞的情景分析	150
一、政治修辞情景的一般特征	151
二、作为“反恐战争”政治修辞情景的“9·11”事件	155
第二节 “反恐战争”政治修辞的受众分析	160
一、谁是“反恐战争”政治修辞的受众	160
二、布什重要政治演说的受众分析	167
小结	170
第五章 政治修辞的共性、效果与限度	171
第一节 从美国“反恐战争”看政治修辞与权力运作	171
一、从美国“反恐战争”看修辞与权力的一般关系	171
二、美国“反恐战争”政治修辞的特性	180
第二节 美国“反恐战争”政治修辞的效果与限度	182
一、美国“反恐战争”政治修辞的效果	182
二、从美国“反恐战争”看政治修辞的限度	185
小结	190
参考文献	192
附 录	205
一、美国前总统布什在“9·11”事件当天的讲话(英文全文)	205
二、美国前总统布什 2001 年 9 月 20 日在国会的讲话(英文全文)	207
后 记	217

导 论

一、政治修辞的必要性、普遍性和功能分析

本书旨在以美国“反恐战争”为例,探讨修辞在政治权力运作过程中的作用或功能问题,也就是政治修辞的作用或功能问题。政治修辞的作用或功能主要是为了实现政治说服、获得政治行为的合法性。这一作用或功能的发挥需要一定的技术和能力,需要一定的政治语言和表达方式,以及一定的政治修辞框架。

我们知道,修辞是人类社会生活离不开的语言现象。对修辞现象的研究也已经有两千五百多年的历史,但对修辞的基本界定却仍然没有统一的定论。通常人们所理解的修辞基本上有四种含义:说服的艺术(*art of persuasion*);良言学(*science of speaking well*);通过象征手段影响人们的思想、感情、态度、行为的一门实践(*the practice of influencing thought, feelings, attitude and behavior through symbolic means*);语言实践中对用词造句进行修饰调整以增强表达效果的言语活动。^① 无论人们如何理解修辞的基本含

^① 关于修辞的界定目前仍然没有统一的定论。这里所提及的四种含义中,前三种是西方不同历史时期(分别为古代希腊、古代罗马和现代西方)对修辞的基本理解,第四种是中国

义,有一点是确定的,那就是修辞是语言的运用活动。然而,由于人们在观察和理解修辞活动时所关注的侧重点不同,就出现了关于修辞的不同观点。归纳起来,主要包括两种基本观点:一是从说服的角度关注修辞的效果,认为语言运用的目的在于影响人们的思想、感情、态度和行为,修辞是一种说服的技术;二是从用词造句的角度关注修辞的技巧,强调修辞是对所运用语言的修饰,以增强表达效果,而目的并不纯粹为了说服,更多的是语言运用上的审美需要。^①事实上,前一种观点并不排斥后一种观点,而是内在地包含着后一种观点。说服的技术肯定也需要在语言运用上进行修饰,以增强表达效果。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认为的那样:“姑且把修辞术定义为在每一事例上发现可行的说服方式的能力。”^②这里的说服方式显然不能排除对语言的修饰,而且亚里士多德还专门就语言的修饰进行过深入的探讨。^③

亚里士多德从修辞演说的角度提出了三种形式的演说:议事演说、法庭演说和展示性演说。其中,“议事演说意在劝说或劝阻,私人场合的劝告者或在公众场合的平民领袖都使用其中某一种方式”。而且,议事演说者“所

现代的一般理解。在西方,上述三种界定是最有影响力和最具有代表性的。(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参见刘亚猛:《追求象征的力量:关于西方修辞思想的思考》,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2页。)第四种界定是当代中国学界对修辞的一般界定。(参见《中国百科大辞典》第8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版,第6090页;陈望道:《修辞学发凡》,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中国修辞学会华东分会编:《修辞学研究》第1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

① 修辞理论上的两种基本观点事实上造成了修辞研究的分野。前者可以说是一种大修辞观,其基本理论渊源是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后者则可以说是一种小修辞观,是西方文艺复兴之后至20世纪70年代的修辞研究,以及中国传统修辞研究的主要理论取向。在西方,20世纪70年代之后新修辞学的兴起逐渐复兴了大修辞观。而在中国,目前主流研究者仍然采用小修辞观进行修辞研究。大修辞观并不排斥小修辞观,而是包含着小修辞观的基本内容。我国著名修辞学家陈望道关于消极修辞(注重事实的修辞,是对事实的陈述)和积极修辞(注重情感体验的修辞)的分类,事实上也隐含着大小修辞观的混合。他从总体上承认我们所说的大修辞观,但在具体的修辞学研究中则是侧重小修辞观,即注重修辞格的研究。(相关论述参见陈望道:《修辞学发凡》,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第三、四、五篇。)本书主要是在大修辞观的理论基础上研究和界定政治修辞。

② 苗力田主编:《亚里士多德全集》第9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38页。

③ 参见苗力田主编:《亚里士多德全集》第9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93—551页。

游说的最重要的事情大致有五种,它们是:赋税的征收、战争与和平、疆土的防卫、进口与出口,以及立法方面的事务”^①。换句话说,亚里士多德所说的议事性修辞演说主要是有关政治事务的修辞演说,其实就是我们今天所关注的政治修辞。概括而言,本书把政治修辞纳入我们的研究视野,正是政治修辞在政治过程中所具有的独特地位决定的。下面我们具体讨论一下有关政治修辞的问题。

正如本书后面还要详加讨论的那样,所谓政治修辞实际上是修辞在政治过程中的运用。它区别于一般修辞的地方主要在于,它是政治主体以政治事务为内容、围绕政治权力而进行的修辞活动,其目的是为了实现政治说服,达到某种政治目的。

本书之所以提出和形成政治修辞这样的问题,主要是修辞在政治过程中,特别是在政治权力的运作过程中是不可缺少的,具有普遍意义,且发挥着重要功能。

(一)政治修辞是政治权力合法化的必要途径

研究政治修辞,需要关注的问题之一就是政治修辞在政治过程中的必要性,也就是研究政治过程为什么需要政治修辞,以及政治修辞在政治过程中的地位。简单来说,政治修辞是政治过程的必要组成部分,“任何人都不可以没有它,它要么能够用来传播治国法则,要么肯定事关一个王国”^②。如果从政治权力合法化的过程来看,政治修辞就是政治过程中政治权力合法化的必要途径。

“自亚里士多德以来,人们普遍持有这样一种观念:政治关系总是以某种方式涉及权威、统治或权力。”“政治学是一门经验的学科,研究权力的形成和分享”,而“政治行为则是觊觎权力而采取的行为”。于是,“权力概念

^① 苗力田主编:《亚里士多德全集》第9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49—352页。

^② [英]昆廷·斯金纳:《霍布斯哲学思想中的理性和修辞》,王加丰、郑崧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1页。

是政治分析的核心”^①，“权力及其相关概念‘影响’是政治科学研究的中心”。同时，“‘政治’表示着活动或过程”。现代政治学不仅研究“国家”和“政府”等概念，而且还要研究过程与“权力”、“决策”、“政治系统”等相关概念。^②因此，可以说权力是现代政治学研究的重要概念，甚至是关键概念，而且政治权力是“在现实的政治过程中运动着的一种现象”^③，是“政治过程围绕的中心和赖以运行的动力”^④。在一定意义上，政治过程是政治主体围绕政治权力而发生的政治行为过程，由政治主体的各种政治行为所构成。^⑤总体看来，政治过程中的政治行为主要包括政治统治、政治管理、政治参与、政治传播等。在政治过程中，政治主体的诸多政治行为均是以政治利益为根本动因，围绕政治权力而展开的，目的在于使政治权力得以实现和运用，同时以政治利益为终极追求。因此，政治利益是政治过程的起点和终点。但是，政治利益的分配只有通过政治权力才能实现，政治权力是分配政治利益唯一有效的工具。相对于政治利益而言，政治权力是实现利益分配的工具。但相对于政治过程来说，政治权力是核心，是政治过程中各种政治行为的焦点。^⑥

既然政治权力是政治过程的核心，是政治行为的焦点，那么获得、维持和运行政治权力就成为政治过程最重要的政治行为。从理论上讲，政治权力首先需要通过暴力来获得。但是，一个有效的政治统治和政治管理却不能单靠暴力手段来维持，只能把暴力作为维持有效政治统治和政治管理的后盾。因此，要维持和运行政治权力，政治主体必须使人们自愿服从其政治

① [美]罗伯特·达尔：《现代政治分析》，王沪宁、陈峰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16、31页。

② 参见[美]杰克·普拉诺等：《政治学分析辞典》，胡杰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17、121、124页。

③ 李景鹏：《权力政治学》，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34页。

④ 金太军主编：《政治学新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01页。

⑤ 关于政治过程与政治行为的相关讨论，参见金太军主编：《政治学新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五章和第六章。

⑥ 关于政治主体、政治权力和政治利益之间的相互关系，可以参见李景鹏：《权力政治学》，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二章；王浦劬主编：《政治学基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二篇第二章。

统治和政治管理,要让人们觉得其政治统治和政治管理是值得服从的,而不是因暴力产生的恐惧或物理力量的强大迫使人们不得不服从。这样,政治主体就要借助合法性获得人们自愿的内心的服从。正如马克斯·韦伯所揭示的那样:“任何统治都企图唤起并维持对它的‘合法性’的信仰。”^①合法性是指:一种政治统治或政治权力能够让被统治的客体认为是正当的、合乎道义的,从而自愿服从或认可的能力与属性。^②也就是说,获得并维持政治权力需要全体或至少是大部分社会成员的认同,并自觉自愿地服从这种政治权力。于是,获得、维持和运行政治权力的问题就成了获得并维持合法性的问题。那么如何获得并维持合法性呢?

让社会成员承认政治权力的合法性,其途径和方法固然有多种,但其中一个重要的途径就是说服他们相信政治权力的获得是正当的,自然也应该正当地继续拥有和运用。毕竟,在政治社会里,人与人之间、集团与集团之间存在着不同的政治利益、政治体验、政治价值、政治信仰和政治态度。在政治权力合法化过程中,这些政治利益、政治体验、政治价值、政治信仰和政治态度的多元化存在,要求那些获得政治权力的人说服那些持有不同政治价值和经历不同政治体验的社会成员相信其权力的合法性。而要说服其他社会成员相信政治权力的合法性,并最终按政治主体的意愿形成社会成员对其合法性的信仰,就必须采取特定的修辞方式进行政治传播。

这种采取特定修辞方式表达政治主张,以获得行为正当性的过程就是政治修辞过程,即政治主体运用政治语言所构成的恰当的措辞、神话、隐喻、传统、意识形态等,或采用各种修辞格、修辞手段等进行政治说服的过程。在日常生活中,人们总要赋予自身的行动以正当性。而在政治过程当中,政治主体则需要赋予其政治行为以意义和正当理由;并且,任何国家的任何执政者都要根据政治情势的需要提出新的措辞、新的纲领和新的理论,从而获

① [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上),林荣远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39页。

② 参见张星久:《论合法性研究的依据、学术价值及其存在的问题》,《法学评论》2000年第3期。

得其政治权力和政治行为的合法性。比如,“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是说明中国古代皇权的合法性以及在皇权合法性基础上产生的某种政治行为的合法性,使普通民众服从封建统治者的政治统治和政治管理。陈胜、吴广起义时喊出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口号,一方面表达了一种理念,另一方面也包含了巧妙的修辞,从而使秦末农民起义具备了正义性,获得了民众的广泛支持,最终推翻了秦朝的统治。而美国前总统乔治·W. 布什(George Walker Bush)^①以“反恐”为理由发动了针对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战争,并把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说成是“反恐战争”,也是为了证明其行为的正当性。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就连日本也把对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的侵略说成是“进入”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或者说是进行“大东亚圣战”,其目的在于建立“大东亚共荣圈”,使日本人民相信日本政府的行动是正义之举,而非侵略活动。可见,政治行动无论是正义的还是非正义的,政治行动者都要以“正义的理由”来获得其合法性。因此,获得并维持政治权力合法性的政治过程,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一个政治修辞的过程。政治修辞是政治过程的基本环节之一,是政治权力合法化过程中必不可少的重要途径。缺少了这一基本环节和重要途径,合法性就不可能获得或维持,就会影响政治权力的存在与运行。根据以上所述,政治修辞在政治过程中的地位可以用图1(见下页)予以简明的表达:

(二) 政治修辞是政治过程中的普遍现象

政治修辞是政治过程的必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普遍存在于政治过程当中,伴随着政治权力的左右——哪里有政治权力,哪里就有政治修辞。政治权力是政治主体的直接目标,但只有具备合法性的政治权力才是有效的政治权力。而要获得政治权力的合法性,就需要通过政治修辞实现政治说服。相对于政治权力而言,政治修辞是政治权力得以存在和运行的工具。因此,政治权力的普遍存在就要求政治修辞的普遍存在。不利用政治修辞,政治

^① 本书中所涉及的美前总统布什,均指乔治·W. 布什,即中文习惯上所谓的“小布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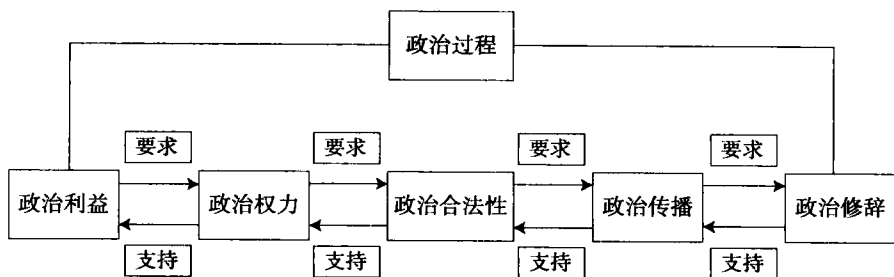


图1 政治过程中的政治修辞

权力就不可能获得、维持和运行。政治修辞的普遍存在可从以下两个方面得到具体解释。

第一,获得政治权力的过程伴随着政治修辞的过程。从古至今,任何一个政权都宣称它所获得的权力是合法的。在其证明其合法统治的理由时,要么是声称它代表着神明进行统治,要么是声称它代表着人民的利益,等等。^① 无论是采取暴力方式还是和平方式取得政治权力,政治主体都要采用各种各样的政治修辞,举起“正义”的旗帜,充当“正义”的化身,以向社会成员表明其获得政治权力的合法性,使人民接受、支持、拥护其所获得的政治权力。纵观世界政治史,没有一个政权能离开政治修辞而获得政治权力。比如,在中国历史上,从“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②开始,历朝历代都有自己的政治修辞,但总体上都是以“天命”作为政治权力的合法性来源。在西方历史上,古代奴隶主政权被说成是神赐的;封建世俗政权被说成是上帝赐予的;而资产阶级的政权则被说成是人民订立契约的结果,人民为了追求自由、平等和幸福才建立了政府。美国《独立宣言》就有这样的表述:“我们认为下述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让与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

^① 马克斯·韦伯认为,有三种合法性依据,即合理的、传统的、魅力的依据。参见[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上),林荣远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41页。

^② 《周易·革》。

人们才建立了政府,而政府的正当权利,则是经被统治者同意授予的……”^①因此,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揭示的那样:“每一个企图取代旧统治阶级的新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也就是说,这在观念上的表达就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有普遍意义的思想。进行革命的阶级,仅就它对抗另一个阶级而言,从一开始就不是作为一个阶级,而是作为全社会的代表出现的;它俨然以社会全体群众的姿态反对唯一的统治阶级。”^②而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也通过政治修辞论证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历史的必然规律,从而证明无产阶级革命及无产阶级专政的正当性,即证明了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的合法性。其后,无产阶级革命领袖及其政党在领导革命运动的过程中,为了让自己的主张能够为大多数人所接受,为了使真理能够迅速传播,为更多的人所掌握,也会采取群众易于理解的、喜闻乐见的语言修辞形式,向群众进行说服教育工作。^③

第二,维持和运行政治权力的过程也伴随着政治修辞的过程。政治权力获得之后,必须得到普遍的、最低限度的社会成员的服从,才有机会得以维持和运行。那么,要获得社会成员对政治权力的普遍服从,与获得政治权力一样,政治主体需要以政治修辞为手段进行政治传播,使社会成员对政治权力的合法性认同上升为社会成员对政治权威的普遍信仰。无论这一权威是政府、领袖还是法律,都需要通过普遍的政治修辞活动建立社会成员对它的普遍信仰。只有这样,才能构成政治权力维持和运行的可靠基础。借用

① 参见[美]罗伯特·艾萨克编:《美国政治思想经典文献选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88页。此段引文直接译自《美国政治思想经典文献选读》英文原文,与国内通行译文略有不同。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0页。

③ 1902年,列宁在《怎么办?》一书中指出:“工人阶级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列宁是说,工人阶级不可能自发地产生无产阶级革命觉悟,需要由马克思主义者从外部加以灌输。(参见《列宁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8—29页。)既然需要灌输,当然也要有修辞,让人民认识到无产阶级革命的人民性和正确性。